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三国与红楼论集

刘世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30432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I207.413-53
05

三国与红楼论集

刘世德◎著



I207.413-53
06



北航

C16506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与红楼论集 / 刘世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1736 - 1

I. ①三… II. ①刘… III. ①《三国演义》研究—文集②《红楼梦》
研究—文集 IV. ①I207.4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154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门小微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25

插 页 2

字 数 448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卷一 《三国》论

- 论《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的异同和先后 (3)
- 罗贯中与《三国志演义》
- 醉耕堂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校点本前言 (22)
- 《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试论
- 《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研究之一 (57)
- 《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本底本考辨
- 《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残本研究之二 (82)
- 谈《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 (92)
-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99)
- 在第三十三节与第三十四节之间
- 《三国志演义》版本散论 (125)
- “捉放曹”: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演义》
- 在“文津讲坛”的演讲 (135)
- 谈《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念问题 (170)

卷二 《红楼》论

- 《红楼梦》
-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词条 (187)
- 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 (217)

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	
——初谈舒本的重要价值	(230)
戚本:《红楼梦》脂本中的一种重要的版本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影印本前言	(240)
关于《红楼梦》杨继振旧藏本的总目	(250)
三论《红楼梦》眉盒藏本	
——答季稚跃先生质疑	(255)
四论《红楼梦》眉盒藏本	
——提供一项新证据	(265)
五论《红楼梦》眉盒藏本	
——再答季稚跃先生质疑	(267)
六论《红楼梦》眉盒藏本	
——再提供一项新证据	(286)
从《红楼梦》前十回看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	(289)
四种《红楼梦》程乙本的差异	(314)
赖大与赖二:角色与名字的转换	(337)
王子腾与王子胜:增添与更换	(355)
从“红学漩涡”说起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	(368)
贾宝玉和王玉辉	(390)

卷三 读红偶说

一 虚化·虚花·虚话	(395)
二 “可着”	(396)
三 两个程甲本的差异	(397)
四 “转来”与“回来”	(399)
五 三个歧异的人名	(401)
六 凤姐是谁的女儿?	(405)

七 檀云回家	(407)
八 何几与何三	(409)
九 何谓赤金绦?	(411)
十 贾雨村的籍贯	(413)
十一 潘文本诗与“大观园故址”	(414)
十二 姚鼐与《红楼梦》	(414)
十三 《椒生随笔》谈《石头记》	(416)

卷四 附录

《何其芳论红楼梦》序	(419)
《红楼梦》与古代小说版本学的创立	
——刘世德先生访谈录	(422)
刘世德:古代小说的新实践	(432)
后记	(435)

卷 一

《三国》论

论《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的异同和先后

一 不是“唯一的一部”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三分事略》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讲史话本。

我们知道,伟大的小说家罗贯中在创作《三国志演义》的时候,曾经参考和借鉴了许许多多的素材。其中最主要的,除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外,还有唐代以来的民间传说、故事和戏剧,特别是宋元两代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讲史话本。在这一方面,宋代的讲史话本没有流传下来,元代的讲史话本今天还保存着两种。一种是大家已很熟悉的《三国志平话》;另一种是大家可能还感到比较陌生的《三分事略》。

《三国志平话》现存建安虞氏刊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另有日本盐谷温玻璃版影印本(1926),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翻印本(1929,上海),海宁陈氏慎初堂排印《古佚小说丛刊》本(1929),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标点本(1954,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全相平话五种》本(1956,北京)。对于它,我国的学术界素有研究,已经发表了不少有意义的论文来探讨它的历史价值,以及它和《三国志演义》之间的嬗变关系。

而《三分事略》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三分事略》现存建安书堂刊本,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有影印《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十卷本(八木书店,1980,东京)。它在最近几年方始为我国学术界所知,对于它的研究和探讨还远远不够。

作为讲史话本,《三分事略》的书名不见于前人的记载。近人有关中

国古代小说的书目，以及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小说史的学术论著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它。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文学史著作追溯《三国志演义》成书过程时，无视《三分事略》的存在，而竟自断言《三国志平话》是“唯一的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小说”^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它会长期沉埋，不为我国学术界所知呢？个中原因，至少有四点可说：

第一，原书在中土久已失传，仅仅保存在东邻友邦。在1980年之前，没有出版过影印本，更没有出版过排印、标点本。似乎也没有日本学者对它进行过专门的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缺乏《三国志平话》那样煊赫的身份。

第二，它收藏于天理大学的天理图书馆。该校和该馆位于奈良县天理市，地点比较偏僻。这又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大学的附属机构。因此不易引起我国学术界人士的注意。

第三，何况它在天理图书馆的藏书中只被看做一般的善本书籍。该馆的藏书，最重要者为“国宝”和“重要文化财产”两级。前者有6种（包括《刘梦得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后者有70种（包括《古文尚书》、《古文孝经》、《五臣注文选》、《白氏文集》、《豫章黄先生文集》），而《三分事略》却够不上资格，未能列名其中。这也是它长期不为外界所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三分事略》的书名，粗粗一看，不像是一部和《三国志平话》一样的讲史话本。即使知道了书名，如果不细读书中的内容，也还是会不经意地让它从眼前溜过去。

二 同一部书而有两个不同的名称

《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都是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讲史话本。它们实际上是同一部书而有两个不同的名称。

它们的共同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一) 情节内容相同。两书都始于汉光武刘秀赏春和司马仲相阴司断狱，止于秋风五丈原和刘渊灭晋。其间的关目，完全一致。

(二) 文字基本上相同。例如开场诗，《三国志平话》作：“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三分事略》仅有两个字不同，即“土”作“王”，“曹”作“官”。这显然是由于字形相近而刊刻时产生讹误。

(三) 行款、格式基本上相同。两书都分上中下三卷；半叶 20 行，每行 20 字；每半叶分上下栏，上栏图相，下栏文字。甚至每半叶的首行首字和末行末字，两书也都保持一致。

(四) 在错别字、假借字和俗体字的使用上，可以总结出共同的规律，如“诸葛”之作“朱葛”、“新野”之作“辛冶”，等等。

(五) 插图基本上相同。插图位于上栏，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每半叶都有一幅。从图中标题，以至人物、衬景来看，它们显然同出一源。

《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是同一部书而有两个不同的名称，这个事实表明什么呢？

首先，这表明它们在那个时代已跻身“畅销书”之列，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使它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恐怕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出现不同的书商接二连三地竞相出版同一部书而更换书名，以招徕生意，扩大销路的可能。

其次，这还从侧面表明，《三分事略》也好，《三国志平话》也好，它们都不可能是书商的作品。《三分事略》的刊行者建安书堂，当即李氏建安书堂；《三国志平话》的刊行者建安虞氏，当即建安虞氏务本书堂。^① 李氏和虞氏的书堂都设于建安一地，由于商业竞争的原因，李氏不会去翻刻或重印虞氏自己创作的小说，虞氏也不会去翻刻或重印李氏自己创作的小说。他们两家如果刊行同一部作品，那只有一种可能：它既不是李氏的作品，也不是虞氏的作品。而从其他方面的种种情况来判断，最大的可能性

^① “李氏建安书堂”及“建安虞氏务本书堂”之名，见于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5 页）所列举的元代书坊表。此表系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录入，其间亦有毛氏所补充者。

在于,《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实乃说话人的底本。^①

三 仍不是同一部书

《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虽然是同一部书而有两个不同的名称,但它们之间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细微的差异,并不百分之百地相同。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仍然不能算作同一部书。

它们的差异又可以归结为哪几个方面呢?

(一) 书名不同。对于一部书来说,书名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却故意避免重复,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名称。一种叫做“三分事略”,另一种则选择了“三国志平话”。

(二) 刊印者不同。它们属于所谓的“建本”系统,刊印于同一县境,福建建安,当时的印刷业中心之一。然而一种出于李氏书坊,另一种出于虞氏书坊。

(三) 图相的刊印有异。如果我们对这两种书的图相细加比较和甄别则不难发现,它们有精细和粗糙的区分,工致和拙朴的差别。无论从绘制还是从刊印来看,都可以断定,它们绝非出于同一底版。

(四) 个别的文字不同。例如《三分事略》“成败”——《三国志平话》“输赢”,其他如“曹公”——“曹操”,“急亡(忙)”——“摇旗”;“长牟(矛)”——“钢牟(矛)”,“赐酒”——“劝酒”,“出轿子”——“下轿子”,“不到”——“都无”,“它军”——“贼兵”。这些词例的性质和“偷道”——“喻道”、“金鼓”——“锣鼓”、“提刀”——“提剑”之类不同,都不是因字形或字音近似而造成的差错。

当然,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足以超越、掩盖或更改它们的共同点。同中有异,或者说,大同小异——乃是在考察了《三分事略》和《三

^① 补充说明:(一)“《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实乃说话人的底本”——这是就它们的正文而说的。(二)至于它们的插图,当为书商所加。插图的增设,标识着书的性质的转变:由说话人的底本而成为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性读物。(三)“话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话人的底本”,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作专门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三国志平话》的异同情况之后所得出的概括性的结论。总之，在它们之间，同为主，异为次；同是大前提，异则仅仅是一些例外而已。

因此，说它们是同一部书的不同的刊本，大概离事实不远。

四 刊刻的年代

既然《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是同一部书的不同的刊本，那就有了先后的问题。它们之中，孰先孰后呢？

这就有必要考察它们的刊刻年代了。

《三国志平话》的封面标明“至治新刊”。至治系元英宗年号（1321—1323）。可知它是元代中期的刊本。《三分事略》的封面则标明“甲午新刊”。甲午是哪一年呢？从元初到元末，甲午只有两年，一为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一为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一在元代的早期，一在元代的晚期。前者约早于《三国志平话》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后者晚于《三国志平话》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查《三分事略》卷上和卷中的首叶首行题署书名作：“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元代以“至元”为年号的有二，一为世祖（1264—1294），即前至元，一为顺帝（1335—1340），即后至元。顺帝的至元年号，共六年，其中没有和甲午相遇者，可以排除。而如上文所述，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适逢甲午。

既是至元，又是甲午，这样看来，《三分事略》刊印于前至元三十一年（1294），按理是毫无疑问的了。

因此，从刊刻的年代来看，《三分事略》早于《三国志平话》。前者是元代早期的刊本，后者是元代中期的刊本。

然而，学者们却提出了两种不同于此的见解：（一）“至正十四年”说；（二）“元明易代之际”说。

第一种见解认为《三分事略》刊行于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例如，天理图书馆影印本的目次在书名下侧特别注明：“至正十四年刊本”。入矢义高教授即持这种见解。^①

^① 参阅《三分事略》影印本卷后所附的《题解》。

第二种见解，认为《三分事略》印刷于元明易代之际。这种见解见于陈翔华同志的论文《小说史上又一部讲史平话〈三分事略〉》。^①

提出这两种说法的学者，尽管见解彼此歧异，仍有互相一致的共同点。他们都认为，《三分事略》是“重刊”或“翻刻”的坊本，晚于《三国志平话》。

他们的说法能够成立吗？

五 “至正十四年”说商榷

看来入矢义高教授对《三分事略》封面标明的“甲午新刊”四字确信无疑。但对《三分事略》卷上和卷中首叶首行题署的“至元新刊”四字却抱怀疑的态度。他因而把《三分事略》的刊刻年代定为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总之，他认为《三分事略》晚于《三国志平话》；“甲午”，只能在刊刻《三国志平话》的“至治”（1321—1323）之后，而不能在“至治”之前。

且看入矢义高教授所阐述的理由。

他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条。（1）《三分事略》的本文，错别字相当多，俗体字也多。它的插图，稚拙素朴，有所简略，不如《三国志平话》精致细密。而从元明两代的通俗书的通例来看，本文和插图粗杂的是后印者。（2）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皇元风雅》后至元二年（1336）刊本，为“李氏建安书堂”所刻，则《三分事略》也同为李氏所刊行。（3）书名“全相三分事略”上加“新刊”二字，可证《三分事略》晚于《三国志平话》。

这三条理由，作为“至正十四年”说的支柱，依我看，是比较软弱的，还欠缺着必要的说服力。

统计错别字和俗体字的增多或减少，这不足以构成判断版本先后的标准。问题在于，人们对于事情本身可能给予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而且还会摆上一大堆理由。张三指出，《三分事略》错别字和俗体字很多，可见

^① 载《文献》第十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